

田野工作的信念与真情

孙庆忠

摘要:田野工作是人文社会科学重要的研究方法。从业者背起行囊赶赴乡村,是对本土知识和民间智慧的问询,也是对自我生活世界的追问。因此,跨越了技术层面的田野工作,不仅是一门有关学术研究的艺术,更是一种心灵的修炼。在这个由经验和情感累积的过程中,行动者既有仰望星空时人与自然之间的会心交流,也有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的温暖与力量。

关键词:田野工作;信念;真情;乡村建设

DOI:10.13370/j.cnki.fs.2017.05.002

田野工作是民俗学和人类学从业者的一个公共话题。在田野中行进,我们的心绪都可能被撩拨,留下一些或悲或喜的难忘时刻。正是这些特殊的人生经历,总是催促我们透过表象问询田野工作的真义。从我第一次下乡调查到现在,飘忽而过的20年间,有一份真情一直秉持于心,这是田野工作得以持续的前提和基础。什么力量可以让一位研究者坚持行走在乡土上?其实是源于田野工作的基本信念。

最近5年,我走了8个省14个县。深入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点,第一个是陕北佳县泥河沟村;第二个是河南辉县西平罗乡的一所乡村学校。前者因36亩古枣园,被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e Heritage Systems,简称GIAHS)。我因在中国农业大学任职,有幸参与国家农业文化遗产的评审工作,因此与陕北这个相对封闭的村落连接在一起。后者因2013年乡村教育调查的机缘,协力在山区创办了一所社区大学,意在推动学校周边的村民终身学习。在这里我关注的核心是,在乡村凋敝的背景下,学校还能否发挥它传统的社会功能,成为拯救乡村的一种精神力量?我在乡村建设上的一点心得,与在这两个田野点的行动与研究直接相关。

一、离土中国与乡村的处境

我们为什么要赶赴田野?为什么要关注乡土社会,关注乡村发展?这些追问都基于一个讨论的背景,那就是“离土”与乡村的处境。“离土中国”是我们系同事集体提出来的一个概念。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乡土中国”这个概念,他认为,中国文化是“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而且一直在土地的封锁线内徘徊:一方面国家的收入要靠田赋;另一方面农民的收入要靠农产,离开了土地就没法生存。^①今天,我们的农耕文明遭遇了工业文明,在和城市化、现代化的对垒中,退到了不能再退的境地,乡村的破败已经成为一种生活事实。这是最大的历史变革,也是农业文化被摧毁的一幕。

作者简介:孙庆忠,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北京100083)。

本文是作者2016年4月1日在贵州大学的讲座稿,感谢贵州乡土文化社的邀请,感谢贵州民族大学王淦同学对录音的整理。

① 费孝通:《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费孝通文集》(第四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176—180页。

在这个时代里,那种小农生活的田园景观已经离我们非常遥远,人们甚至觉得那是落后的象征。在城市中心主义的驱动之下,乡村面临的主要困境,是跟城市相比之后的自愧不如。在这种背景下,乡村生活方式已经被改写,城市的观念以及各种信息充斥着乡村,从而改写了乡土中国的发展轨迹,“离土”业已成为乡村的主旋律。2016年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5年中国的城镇人口已经达到77116万人,占总人口的56.10%,农民工总量已达27747万人了,比上年增长1.3%。^①这种在城乡之间流动过亿的人口,标志着中国社会从结构到层次上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改变。这些数字标志着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也是我们乡土社会血缘和地缘关系松动、家族和村落文化衰败的一个真实写照。

很多人质疑,乡村在与不在有那么重要吗?很多人认为,这种快速的城市化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岂不是中国社会共同追逐的目标吗?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村落的价值。^②我们提及的乡村,不是一个孤立的观念,而是由一个又一个藏在深山里、在河边、在岸头的小村落构成的。传统村落是整个农耕时代的物质见证,它所包含的那种风景是人们生活赖以依存的最核心的部分。它是在当地人生产或生活实践的基础上,经由他们共同的记忆而形成的文化、情感和意义体系。所以村落不仅仅是几十户或者二三百户构成的聚落单位,里边传递的是世代代的情感,每一个乡村物象都熔铸了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精神和记忆。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绝对是一个特殊的象征体系,汇聚的精神内涵是超乎我们想象的。

我们时常遥想故乡。故乡是什么?不仅仅是破败的村落,更是村落里藏着的故事。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知道每一个村落从视野中滑落,就真的永久性丢掉了,它割断了很多人的家园和根脉。在发烧式乡村改造力量的驱使下,村落消失的速度在新世纪头十年是令人震惊的。2000年我国的自然村落有363万,到了2010年只剩下271万,十年间92万个村落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换算一下每天逝去的村落就有252个。^③也许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为生活所迫之时,还无法感知到这个村落对他们未来的意义和价值,但如果有一天他们需要回望自己故土的时候,村落意识就会凸显。

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看,迎生和送死是整个乡村生活的基本节奏,这种节律的辈辈相承构成了绵延的现实人生,而展现这种人生悲喜的场域就是今天爱恨交织的村落。我们常说中国文化传播了上千年,其核心部分就是乡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都在村落里自然传承着,原本不需要刻意去存留。只是在凯歌高奏式的城镇化进程中,其生存的土壤崩溃瓦解了。所以非遗不是保护的问题而是如何抢救的问题,它们一旦消失也就难以重来了,这就像存在我们头脑中的记忆一样。

费孝通先生曾在《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一文中说,中国文化被称为“乡土文化”,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根脉就在土里。所以美国的农业科学家金(F. H. King)才说,中国人跟土地的关系太紧密了,活着的时候靠土地生活,死后要让身体回归土里。他认为中国人像是整个生态平衡里的一环,这个循环就是人与“土”的循环,从而实现了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处,这就是中国人特殊的文化理念。^④我们不去谈大而言之的儒释道,就民间文化的传承来说,正是因为这些生生不息的观念与记忆,以及那些乡土社会里带有温度的标志物,才让我们在回望的时候始终对村落一往情深。可是如此投注情感的地方,今天已然变了模样,那里已经缺少了孩子的欢笑声,曾有的学校也因撤点并校而被抽离掉了。昔日的“文字下乡”也变更成了“文字上移”。这种“上移”是向城市靠近,是用城市文明取代乡村文化。过去乡村有孩子,而今乡村的学校没有了,孩子不得不离开乡村。到哪里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民日报》2016年3月1日。

② 孙庆忠:《社会记忆与村落的价值》,《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③ 冯骥才:《传统村落的困境与出路》,《贵州民族报》2014年2月18日。

④ 费孝通:《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费孝通文集》(第四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176—180页。

去呢？既然可以到乡里那就索性去县城，如果能去县城那就索性到市里去读书，结果就是乡村难逃落寞。有一组数字可以反映出这种事实，截止 2014 年底，我国流动儿童 3581 万，留守儿童 6973 万。所谓的留守儿童也不都在村里，而是指与父母分离的那部分孩子。56.8% 的流动儿童与户籍地没有联系，他们根本不知道家乡所在乡镇的名字。^① 这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事实。这组数字能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下乡村的处境。过去我们走到哪里都会记得故乡，但今天又有多少孩子或者在城市里上学的孩子还能够详细地说出自己家乡的县、乡和村。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悲剧！2012 至 2013 年做乡村基础教育调研时，给我带来的那份痛楚感至今记忆犹新。故乡的名字都记不得了，还能期待他们有什么乡村体验和对乡村的情感呢？

面对如是这般的现实，我们无法想象乡村文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还能传承，那些祖辈相承的生活叙事是否还能发挥其延续文化根脉的作用？当作为实体村落的故乡渐行渐远，作为精神的故乡也不复存在之时，我们是否还能游走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是否还能拥有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过去的生活存在于人们的心中，人们会带着这些往事活下去并从中获得生活的意义。

二、集体失忆与乡村复育的使命

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群体，都拥有各自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都不会忘记那些体现其集体价值观的往事。因此，集体记忆是保存社会文化的载体，也是连接个人与社会的纽带。雅各布斯(Jane Jacobs)以爱尔兰的实例阐释了这样的认识。征服者英格兰人为了己利，对信奉罗马天主教的爱尔兰人进行了残暴的入侵、屠杀和压迫。“饥荒”“瘟疫”“战争”和“死亡”残害了爱尔兰数百年。但在这些磨难中，圣经启示录中的四骑士一直未与第五位魔鬼般的骑士“遗忘”会合。爱尔兰人很顽强地记住他们自己的身份，拒绝失去他们宝贵的文化。这种惊人的成就主要是通过民歌这个脆弱的媒介做到的。正是这些哀怨动人的曲子使得他们及后世子孙不至于遗忘过去曾经丢失了什么。^② 相形之下，我们对农耕文明而言，同样处于集体失忆的边缘。失忆是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记忆，如果因为一个突发的事件让我们一下子忘却了自己的角色，结果会怎样？虽然肉体生命还在，但是我们的精神已经没有了。不知道自己的过去，就意味着不知道自己的当下，更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今天的中国社会恰恰就面临着这样一种可怕的处境：这是一个集体失忆的时代，我们失去了乡土，也就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根脉。

我们在河北、河南调研时看到，6 岁的孩子就离开父母住校了，好像这样他们可以接受最好的教育。到底什么是最好的教育？难道在小学的时候学两句英语就是最好的教育吗？难道在小学里不学音乐、美术就是教育的缺失吗？我觉得跟学外语、美术和音乐相比，孩子们对于乡土文化的亲和感和那份童年记忆才是不可或缺的心灵底色。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认为，每个家庭都有其特有的心态，有其自己单独纪念的回忆，以及只向其成员揭示的秘密。这些记忆不仅再现了这个家庭的历史，也确定了它的特点、品性和嗜好。正是在这个共同的背景中，家庭成员获得了他们那些与众不同的特点。^③ 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举止做派里都有家庭的影响。6 岁就生活在群体中的孩子无法感受父母耳濡目染的教育，这是一辈子的缺憾。中国社会面临的这种失忆危机，在“90 后”“00 后”这一代人的成长中会越来越凸显。

乡村最可怕的不是某个庙倒了，因为心里的庙还在就可以了。最可怕的是记忆没有了，这就等于我们掘了自己的祖坟。城市中心主义的教育已经让人们忘却太多，让乡村的孩子忘却乡村。在他们的印象中，家乡的青山绿水是穷山恶水。我们走过的乡村学校周边环境都很美，但是问孩

① 孙庆忠：《文化失忆与农村教育的使命》，《人民政协报》2014 年 12 月 10 日。

② [美]简·雅各布斯：《集体失忆的黑暗时代》，姚大钧译，中信出版社，2007 年，第 220 页。

③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103 页。

孩子们,没有一个人说美的。因为那些山看得见却摸不着;校园边上就是小河,能听到水的声响却无法触摸。他们虽然生活在乡村,但实际上离乡村生活太远。老师为什么不带孩子们出去?因为有风险,万一孩子从山上摔下来,教职生涯也就结束了。老师从早到晚要看着学生,晚上他们不睡觉老师就别想消停。他们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焦虑中过活的,这就是乡村教师的处境。我们没有资格责备他们,我们只能说孩子们太可怜,虽然生活在乡村,但那个乡村对他们来说却是陌生的。孩子们对家乡的名人、独特的自然风物真的不知道,已经把家乡那些值得骄傲的历史和人文抛弃得太远。这是我们人为制造的失忆!

村落的养生送死有一套内在的机制为村民所信守,乡村道德的力量更是一条无形的纽带。我们曾请泥河沟几位村民到北京,在农业大学座谈。有个小伙子叫武雄,他在鄂尔多斯开影楼,却一直关心家乡的发展。我们见面时,他的头发理得很新潮,一半的头发剪得很短。我跟他说:“我们要去泥河沟村,你回去吗?”他说:“不行,这头发必须长到两边能剪到一齐的时候才能回去,要不然会被村里老人家说的。”这种乡村礼法对他这位30多岁的年轻人还是有影响的。再往后的一代人可能回都不回去了,村里怎样,与他们无关。正是因为对家庭生活、自然环境、家乡历史和村落礼俗的漠然无知,使得乡村进入到了乡土失忆的时代。那么,要从哪里入手来拯救乡土呢?我在两个田野点所做的工作正是要解答这个问题。

每个人其实都是活在记忆里的。我们的民族活在记忆里,我们个人活在记忆里,没有这份记忆我们真的不知道我是谁、不知道明天该如何生活。我的学生在听完我的人类学课之后告诉我,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冲动,那就是回家要去采访爷爷奶奶,要问问外公外婆,让他们讲讲妈妈爸爸的故事,讲讲他们年轻时候的故事。有一个学生说:“每年到年终岁末的时候,我妈妈总要做一件事,擦拭他们单位每年给员工发的一枚纪念币。我一直不理解每年像一个固定节目一样就在那里摆弄,一年一年擦,一直到她退休。听完了老师的这门课程之后,我才知道那每一枚纪念币的背后都有我妈妈一年的生活与记忆。”当她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人类学在大学的课堂里应该是一门通识课,应该让每一个学生都有一种珍惜自我、珍惜别人的心念。如果对自己的祖宗八代都不清楚,还会对别人的宗祠感兴趣吗?所以我一直在强调,我们要培育一种性情,我们想爱别人首先要爱自己,我们尊重别人的生命首先要尊重自己的生命。

事实上,每个地区都是有历史记忆的,对一个民族来说更是这样。如果忘却了历史,丧失了记忆,我们的民族就没有希望了。理查德·尼克松有一本书叫《1999:不战而胜》,在这本书中他说道,当有一天,当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不再相信他们老祖宗的教导和他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美国人就不战而胜了。^①看到这里真是胆战心惊啊!如果把慎终追远的观念忘却了,我们这个民族就与没有根底差不多了。

人类学家乔健先生在《漂泊中的永恒》中讲到,瑶族的祖先世代代寻找祖居地,战乱时期迫于生活不得不漂泊,等到安静的时候依然要漂泊,还要去寻找他们的祖居地。^②寻找的是什么?真的就是那么一个桃花源似的'地方吗?那是一个民族生活留下来的美好愿景,是一份特殊的历史记忆。一个民族在世世代代的漂泊中,总要寻找到祖居地,那是民族生存之根。而我们今天把老祖宗的东西似乎抛得越远越好,连回头的瞬间都没有了,难道我们这个民族还不是处于集体失忆的时代吗?一个有深度的社会是一个拥有社会记忆的社会,而这份社会记忆需要老一代及我们这一代人肩负起传递的使命。

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提出“乡土重建”,今天台湾有一个词叫“乡村复育”,这也是我们整个田野工作的目的所在。只有这样,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工作才会有学术生命的延续,才会有

^① [美]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杨鲁军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

^② 乔健:《漂泊中的永恒》,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

村落文化的生生不息。我们今天的核心工作就是复育乡村,并将其创生性的力量重新演绎留给后代子孙。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中国不可能走完全城市化的道路。人口学家预测再过40年还将有5亿人生活在乡村。有这些人在,乡村就割舍不掉。我们姑且不说今天中国多么富裕,可以通过进口解决生活所需。但是人除了肉体生命之外还有精神上的诉求。当我们回望自己祖先的时候,当我们试图想象那些遥远往事的时候,被虚无的历史,连同那些失落的记忆,会使我们的后辈精神崩塌,所以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的使命太重要了。

我觉得每一次乡村之行都在践行着这种使命。去年假期,我带学生在乡村待了42天。学生为什么愿意跟我下乡?大热天,半个月洗不了澡,每天都要努力工作,还不能叫苦。我曾说,孩子们是被我“骗”来的。我经常讲的一句话是:“跟老师下乡吧,下乡会给你的大学活一个完满的记忆。还会因为你的努力记录一个永远都不会有翻版的故事。如果做得好可以把它出版存在国家图书馆里,等你成为祖爷爷或者祖奶奶的时候,你孙子的孙子还可以在那里看到你在读本科时所做的工作。”其实,我很清楚,“祖爷爷祖奶奶的作品孙子还能看到”,这件事不足以吸引他们。最关键的是,他们在几年的社会学专业训练里培育了一种对学科的感觉,因为社会学的学科视野让他们发现了一个美丽的存在,所以他们才能够倾注心力来做这件既服务乡村,又增长才能的工作。如果仅仅是一个向度的为乡村做事,而我们的内心是空空荡荡的,那不会有人去做,二者必须双赢。所以田野工作表面上在记录他者,究其本真是在记录我们自己,是在为我们自己寻找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这是田野工作的命脉所在。

我们想要复育乡村,给乡村带来活力,应该怎么办?我们一己之力到底能够为整个的乡村复育做什么,我们怎么赋予自己的行动以时代意义和学术价值?这些问题是我们每次出行都要追问和思量的。我最近三五年的乡村之行,虽然无力感常袭心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在往外放气,而是不断地聚集内气。在这个过程中我获得的充盈感和幸福感,超越了我过去任何一个时期的伏案工作。这份难以名状的心潮起伏,就是田野带给我的独特思考与心灵体验。

三、陕北泥河沟村的田野叙事

陕西佳县泥河沟村因36亩古枣园,2014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个曾经封闭的村落保留着非常古朴的形貌,三面环山,面朝黄河,对岸是山西省临县。2013年开通的沿黄公路,密切了村庄与外部的联系,从县城到这里只要半小时的车程。村民们曾感慨,要是早点开通沿黄公路,这里就不会这么穷了。我说:“沿黄公路如果10年前开通,这个村落就不可能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也不可能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了!”

古枣园中树龄最长者已经有1300多年,3个人才能把它环抱。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在干旱洪涝频繁的地区,这些枣树竟然生长千年,而且每年依旧枝繁叶茂、硕果累累。除了这些自然景观,村里有清末修建的戏楼,有雍正和道光年间重修的龙王庙和河神庙,有十余处百年以上的窑洞院落。尽管上世纪70年代末村民集体建造的十一孔窑早已破败,但那里却承载着村民对乡村学堂的记忆。在这个窑洞错落分布的山村,有一处历史久远的特殊景观,那就是戏楼近旁的“人市儿”。这里是老百姓每天聚集聊天的地方,无论冬夏。人们也把戏楼通往村口的路,戏称为“泥河沟的星光大道”。每天劳作之余,村民都往这一站或骑在墙上聊天。我们刚来调研的时候,学生走过人市儿时都紧张得不敢抬头,因为这两排墙上坐满了村民。每次经过,两边的目光都对着你,你只能保持微笑从这头走到那头。这条路后来成了我们与村民交流最多的地方。

2014年6月我们入村调查时,这里共有213户,806人,常年在村的有158人左右,60岁以上的111人。在村的老人百分之九十我能叫上名字,家里祖宗几代谱系我都清楚。有一次县委副书记到村里看我,他说:“教授,我听说这里的老百姓都信你的,你也都认识他们。过去这村很多事难办,什么命令都不听,现在一说孙教授说的,这事情就好办了。”我说:“我在这里跑上半月二十天,

除了干扰他们劳动外,别无所能。”那天正好人市儿的墙上坐着 11 个老汉,于是我就一一叫出他们的名字,介绍他们的家庭情况,还说出他们的儿子在哪里打工。虽然有一个人我没有叫出名字,但县委书记服了。做田野工作要想真正走入村民的生活,走进他们的心里,做不到这点是不行的。

我们的村落调研,目的是利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契机,让这个没有文字记载的村庄拥有自己定格的历史,因此,与村民共同找回村落记忆,继而使其参与保护行动,最终成为农业文化的守望者、传承者,既是我们驻村工作的起点,也是当下乡村建设的目标所在。我们从搜集老照片、老物件入手,村庄尘封的往事得以呈现。村里的老照片有的挂在家里的墙上,有的是压在柜子里。我们在采访中对这些老照片的珍视,让他们也觉得这些的确是搁置的宝贝。后来,只要我们把翻拍的照片一拿到人市儿上,他们全都围上来。这是谁家的老子,那是谁家的娃娃。我们的工作就从这时开始步步深入了。

在村里,看似平常的老物件一旦被问及,曾经的人和事就会被唤起。1943 年出生的王春英,她家有一个木箱子。她告诉我说:“这箱子是我出嫁的时候,我妈妈给我的。”过一会我跟老人家再聊,她又告诉我说:“这个箱子是我外婆在我妈妈出嫁时给她的陪嫁。”我一算她外婆是 1898 年出生的。这个箱子是个“破烂”,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用图片的方式记录下来,有一天十一孔窑能成为“乡村记忆馆”的话,把它放在那里,无论是她的儿子还是孙子,只要回到泥河沟村就一定到那里去看,因为这个箱子是有故事、有温度的。当我们把这些有情感的物件用相机重新记录的时候,我们不仅存留了一段又一段家庭的历史,也收藏了一份温暖的生活记忆。陕北村落没有南方的宗祠,但是那里可以有纪念馆。我很希望十一孔窑能成为一个类似于南方家族祠堂的地方,那里存留着村庄的记忆,是关乎于每个家庭的记忆。

我曾经感慨村庄连 300 字的记载都没有。原计划第一年我和学生在那里调研之后就可以动笔写村庄文化志了。可是我又去了两次之后才发现,田野工作是永远做不完的。我们第三次去调研,曾经的风水先生武瑞全给我看了他珍藏的宝贝儿——祖上嘉庆十五年的地契、咸丰九年的出租地账、同治元年的赁窑老账、民国元年的迎婚礼账。尤其令我难忘的是,这位古稀之年的老人,捧起他妈妈 1950 年用毛笔书写的日记时的那份神情。那一刻间,我真的抱愧泥河沟!这样的发现给我的启发是,永远不要拍胸脯说自己把田野工作做到位了。和学生每一次去村里时,我都会问他们能坚持几天?但是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他们总会问:“老师,我们下次什么时候来?”他们好像已经忘却了半个月没洗澡,只觉得田野工作始终是刚刚开始。

与搜集老物件同时,我们通过口述史的方法,采写了那些在乡村里生活的父一辈、子一辈传承的村落故事。在他们的讲述中,破旧的十一孔窑与乡村学校的兴衰连在一起;河神庙、龙王庙与他们的灾害记忆一并而至。他们饱受过黄河之苦,也曾享用过水运之便。如今,码头已不见踪影,艄公已走下船头,但痛苦与欢乐并至的往事却总是呼之即来。那些贯穿村庄的水利工程、那座护佑枣林的拦河大坝,那条背扛返销粮的陡峭山路,都留下过他们的汗水与泪水,承载了村落的集体记忆。正是通过这样的记录,有关“文革”时期青年突击队、铁姑娘队、老愚公战斗队、红色娘子军队的记忆被唤醒,村中那段激情的岁月也因此得以重现。^①

别小看一个村子,正是因为它是世代累积的一个象征和情感的体系,已经转换成了生命实体,所以哪里会有探问的穷尽!一个人的故事都可以讲上几天几夜,更何况是一个村庄故事呢。对搜集村落旧事的这份慎重,实际上是对民间文化的敬重,没有这份情感我们的田野工作充其量只是一个“盗贼”的角色,不过是到那里套取一点知识写一篇文章,完成自己职业生涯的一种工作而已。而要想把它转化成为一种内在的动力必须要改变思路,要改变我们对田野工作的基本态度。

^① 孙庆忠:《佳县泥河沟村:以农业遗产保护延续枣缘社会》,《世界遗产》2015 年第 11 期。

我们在泥河沟村做调研之初,从县乡领导到村民,农业文化遗产好像是飞来之物,不知为何。2015年夏天我们在村调研时,主管农业的副县长去看我们,见面后给我讲了佳县82万亩的枣树现状、每年遇到灾害怎么办以及如何增产的问题。我接着他的话说:“县长应该回家去磕头,感谢老天爷,让这里连续4年红枣近乎绝收。”在场的人都诧异了,怎么还说让我们感谢老天爷,还说绝收是好事?我说:“如果按照全县丰产的状态,全年能产6亿斤枣,咱不说丰收,就是正常的5亿斤枣,如果卖不出去的话,农民就得天天坐家里骂县长无能,就得去县政府找你们想办法卖枣。所以是老天爷帮了你们,农民只能上龙王庙,上河神庙去拜,却不骂你们,还说县长挺好的,经常来我们村问寒问暖。”所以我说一个高明的县长要知道农业文化遗产是个金饭碗,不能抱着它四处要饭,要打造并利用这一品牌,要在农业功能的拓展中寻得发展的机缘。这才是管理者的智慧。

我第一次去调研的时候,村里的老人说:“这个戏楼这么破,你们能不能帮我们重建一个?”我说:“这个小戏楼拆掉能行吗?”他说:“换个新的不好吗?”等我们在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佳县老科协与农大团队举办了一台晚会。我在晚会上讲话说:“2014年4月29日意大利罗马传来了一个消息,中国西北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竟然成为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全世界才31个,泥河沟村的古枣园就是其中一个啊!”就这么一台晚会,就这么几分钟的讲话,第二天村里不再平静了。早晨4点半我去上厕所,一个老汉在那里徘徊。我问:“老人家这么早就起来了?”他说:“我在等你啊!我差不多一宿没睡觉,4点钟就到这了,我要给你讲,我昨天晚上又想起了两个传说。”与这种追忆的热情同在的是,那个破败的戏楼竟然成为老人们保护的對象。村民这种观念的转变,让我真切感受到村庄不是沉寂的,不是死水一潭,是急需像我们这样一拨人走到乡村去唤起他们回忆的热情。这一年的表演,我的学生还把他们的调研资料编成剧本。因为在村里采访的任务太重,只是在去武姓祖坟回来的路上试排一遍,所以表演的时候还记不住上场的顺序和台词,只好安排一个学生对准笔记本指挥。看着学生们表演村里的故事,看着他们并不专业却投入真情的表现,老百姓都乐得不行!这是村里几十年都没有的事情了。

正是因为我们的驻村调研,第二年再去的时候有300多个年轻人回到村里。他们是欢迎,也是解疑——真的有人会来关心我们村的事吗?我的学生到那里的时候都不敢下车,因为乡亲们已经穿上了他们扭秧歌的盛装,在村口欢迎农大师生的到来。那一刻间我就觉得,其实我们已经不是在做简单的村庄调研工作,而是给人以希望!2015年7月19日,村民自编自演了一台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周年庆典晚会。这种寻求改变的行为,让我看到了村庄内发性的力量。82岁的老石匠武子勤自编快板,大字不识,完全凭借头脑记忆,唱泥河沟的历史,夸奖农大的学生。就在那个瞬间,我坐在那里几乎忘却了一切,这山村、这世间好像只有我和这台晚会的存在!

陕北秧歌扭起来有一个特别熟悉的曲调,欢快的韵律让每个人听了都很欢喜。但今年1月13日当我们离开泥河沟的时候,村里的年轻人开车相送,又放起那首耳熟能详的《闹秧歌》时,我突然间不说话了,一种流泪的冲动涌上心头,我的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悲伤感,因为那乐曲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是一首秧歌曲调,而是跟我今年去关注的扶贫,跟每一个家庭带给我的冲击——那种贫困却乐观生活并勤于劳作的冲击,紧密连接在一起。虽然那一刻间我听到的声音是欢快的,但那是在苦中作乐,那是在贫困中给自己希望的锣鼓声响。调研中,我听闻了一家又一家的故事,他们在贫困中艰难生活。60多岁的妇女还背50多斤重的大石头修河坝,就是为了一天挣一百元钱替儿还债,因为这里的枣已经欠收4年。这样的事总是让我的心里不是滋味,所以下乡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是记录别人家的事,而是记录我自己的心事。

四、河南辉县的乡村教育实验

2013年6月,我带领4名研究生到辉县做乡村基础教育调研。之所以从事此项研究,目的是寻找乡村教育的变革之路,探索教育促进乡村发展的可能性。调研期间,我们走访了侯兆川教育

文化中心,因其位于群山环绕的川地中心,这里又被称为“川中”。这所辐射周边十几个村落的学校,包括幼儿园、小学和初中,大约有1380多名学生和112位老师。我们将目光聚焦在学前教育,核心的考虑是孩子们不住校,可以通过他们的老师,更多地了解周边村落的情况。在与20位幼儿教师的接触中,这拨年轻人深深地感动了我。她们的家都在县城,因距离学校有将近40公里,所以只能一个礼拜回去一次。她们有的刚刚结婚,有的刚休完产假,却一直坚守在乡村教育的第一线。当我知道她们的所思所想,看到她们的所作所为时,便萌生了一种服务乡村教育的冲动,激发了通过学校教育“复育”乡村生活的强烈愿望。我希望能为这个群体做点什么,让她们在乡村也能获得专业技能的成长,获得被肯定的成就感和幸福感。同时,也希望能唤起她们的教育热情,让幼儿园成为附近村落里留守妇女继续学习的场所,把学前教育和成人教育链接起来。

我的这种想法跟幼儿园园长一拍即合,并于2014年3月试办了川中社区大学。遗憾的是,我的这位同道因为癌症去世,这份心愿我不得不代她完成。每个学期我自己做义工去那里培育这个年轻的团队,去为农民上课,每一次都会收获很多的感动。这样的工作虽然有些辛苦,但我的精神生活异常丰富,是因为有那么多的乡里乡亲用最真挚的情感来温暖我的心,有那么多肯于奉献的年轻人在温暖着乡村,我觉得是她们在给我力量。

2014年5月30日,我在给乡亲们第一次上课时就明确了川中社区大学的定位:它不是家长学校,不是农业技术学校,而是一所成人终身学习的公民学校。^①两年多时间里,先后有来自学校周边8个村落的200多名学员走进社大。她们有烹饪课,还有绘画课、朗诵课、舞蹈课,她们的表现简直超乎想象。她们原来不会画画,今天却能画出好作品;她们会编手工,还能给别人讲故事;奶奶级别的文盲,在我的课上学会了写字。我的课叫“社大幸福课”。我和她们说:“你不要为儿孙活,要为自己活,要活出你自己的精彩。”有一次上课时我对一位64岁的老人家说:“咱俩对口令。”她站起来说:“我们的口号是,忘了”,全班同学都哈哈大笑。过一会,她说:“我想起来了,‘社大幸福课’。”坐下后她对我说:“我从这个屋走到那个屋就忘记我去干什么了。从小放过牛、捡过柴,就是没拿过笔,可是在这里上课我就爱听,每次都不落下课。”这样的故事不断地发生着,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乡村需要”。我们曾在成立之时和周年之日举办过两次庆典,十里八村的老百姓都围在这里,这个全面展演幼儿园孩子和社大学员才艺的乡村大舞台,已经让侯兆川拥有了两个不眠之夜。

去年夏天有一件让我很感动的事情。在周年庆典的座谈会上,学员郎晓云说:“我从嫁到了西沙岗之后就觉得,我原来是刨地的,现在还是刨地的。我怀孕生了孩子后,好像得了产后抑郁症,每天像疯了一样,然后我就愤怒,天天和我的老公吵架,我的日子除了围着地转就是围着锅台转,太无望了!我只能把愤怒都发泄在麻将桌上。但是自从有了社区大学,有一个叫做艺术的东西离我那么近。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我的生活变了,我对我孩子的态度变了,我家里的日子都变好了。”讲到这里的时候她哭泣了。《教育时报》的张红梅副总编跟我对视一下,她一下子也流泪了。然后我说:“社区大学就是一个种子大学,今年只要能有一个晓云这样的,明年也能有一个,这就够了。我相信有一天我们的社大能影响你们每一个家庭,能影响周边的十几个村落,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当我回到学校跟我的学生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其中的一位突然间站起来说:“老师我一定要讲,这不是一所社区大学,这是宗教,分明在昭示一种精神,义工团队在为别人建构生命意义的同时,也在为自己寻找着生命的价值。”他说的时候我的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那一刻间我有两种欢喜,一个是为我自己做过的工作,一个是为我的学生有如此这般体悟生活的能力。当然,社大与任何宗教毫不沾边,我们只是在帮助别人建构一种生命的价值,同时我们自己的生命也因此而得以净化和绽放。

^① 张红梅:《辉县川中社区大学:平民教育与乡土重建》,《教育时报》2014年6月6日。

今年1月我去上课的时候,幼教团队的老师告诉我:“孙老师,咱们今年6月2日两周年庆典还要办一台大型晚会,而且我们有一个想法,明年我们要走进东沙岗,后年走进西沙岗,大后天走进中坪村。从幼儿园的小学员到我们的老学员、爷爷奶奶们齐上阵。”这台晚会老百姓年年都盼望着,但是晚会结束后,这帮幼教老师们全都累倒了。当我想到她们如此劳累,每天工作之余要去排练,我都觉得非常心疼。但是半夜12点她们全都起来了,欢悦的心情使她们一宿都没有睡觉,为自己能够完成一件给那么多人带来欢乐的大事。而事实上,她们给学员上课没有分文的报酬,完全是奉献,但是她们获得了一种内在的满足和力量。

我自己常常感到万幸的是,一个普通的大学老师能在乡村里培养一个团队,能让她们为付出而满足,能给侯兆川的乡亲们带来那么多欢乐,能给那些留守的妈妈们一个“重新学习”、“终身学习”的机会,能和她们一起编织生活的希望,个人价值的体现还有什么能超越于此呢?我哪里是在帮她们,是她们让我始终能有一种激情投入到乡村建设中来,这本身就是属于我的莫大幸福。

我们存留乡土的意义是什么?这样的案例可能会使我们想到身边那么多的村落。我们可以呼唤年轻人回来,但是现实条件是他们回来无法生存。我今天在飞机上想到这里的时候,写了这样一句话:“当他们为了生活疲于奔命之时,当他们因为生活无奈而暂且忘却故乡的时候,就让我们来为他们守望吧,也许有一天我们会一路同行,就在乡土里重新发现你我。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不只是在为别人疗伤,也是在为我们自己疗伤,在寻求生命的意义,也许在那一刻我们才能发现那真切的属于我们自己的生命之光。”如果在那些曾经凋敝的乡村,依然有如此美丽的存在,某一天有一种生活、有一种精神在呼唤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搭车前往,可以栖居停留,因为那里留着祖先的记忆。

五、田野工作的诉求与真义

在乡村的田野工作要带给我们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怎么来认识田野工作的价值?赶赴乡村让我们认识到那些传统的生态景观蕴藏着祖祖辈辈的生存智慧,我们也可以在搜集家谱、地契,搜集老百姓头脑中记忆的过程中,去熟知和传承地域文化。但于我而言,最想讲的是,田野工作能够培育我们创造生活的情感和能力。因为人是活在情感里,活在能力建设中的。作为一个乡村的行动者,我们不仅可以唤醒别人的生命意识,同时也能唤醒自己;我们不仅可以用情感去传递一种力量,同时也能在不同的时间里温暖自己的心灵。所以田野工作本身是情感的学问与实践。

我们寻找乡村记忆实际是寻找祖先的历史,也就是在寻找我们自己前行的动力。如果再把它延伸一步,我们唤醒村民热爱生活的能力,就是让自己觉得活得特别有意义,就是在提升我们自己的生命品质,这才是田野工作的精髓所在。我跟我的学生也这样分享——我们去做访谈,去做某人的口述史,实际上是在共同完成一个人生命史的写作,而生命史最深邃的部分是心灵史。我们的田野工作表面上是在问询他者,实际上是在问询我们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我曾经用6句话概括我对田野工作的理解:“用你的眼睛观察村民的日常生活;用你的学识把握文化背后的逻辑;用你的真诚开启心灵之间的交流;用你的感动记录封尘已久的故事;用你的良知回应亲历的田野之声;用你的智慧书写浓抹的专业真情。”这是2004年我带学生下乡时半夜起来写下的,好多学生把它视为“田野箴言”。我一再强调田野工作不是技术,而是修养,是一个人道德良知与生活智慧的综合展演。以研究者为工具的田野调查,考验的是专业技能,更是行动者的心理品质。这6句话是当年总结出来的,也是一种理想形态。回首过去几年的所为,值得庆幸的是,我依然没有偏离这个方向,而且比那个时候做得更加深入了。2009年我去台湾采访了一个NGO组织——风信子精神障碍者权益促进协会。我问那里的负责人刘小许,如何看待这份工作?如何解释自己的人生?她说:“不要说我在疗救别人,实际上我在用自己的行动来化解我的心灵之痛。做农业让我有一种新的认识,那就是有机地对待土地,有机地对待精障朋友。”这是她给我印象颇深的一段讲话。当

我们把这种认识延伸过来,就是要有有机地对待家园、对待乡村,有机地对待我们的生活。

我们今天在这里畅想美丽乡村,谈论那些行将消逝的村落记忆。也许只是浪漫的幻想,但是只要我们从这里开始做起,那些被称为“乌托邦式的乡土”可能就会重现,这就是我们的乡土梦。而随着那些被删除的记忆一点点远去,我们努力做的工作让我想起了八个字——“逆风而行,逆流而上”。我们可能偏离了城市化这一主流,却做了这个时代里我们这一辈学者和行动者最该做的事情。我们没有放逐“乡愁”,而是在拥抱这份情感并把它重新放回到人们的心灵深处。这是乌托邦的梦想吗?这是一种真切的使命和期待!

在泥河沟村的夜晚,你会看到满天星斗,人和自然是如此的接近。在那里可以听到美妙的自然声响,这星空和星空之下的一孔窑洞可以唤醒我们的想象和记忆实在太多了。台湾辅仁大学夏林清教授有一本行动研究的著作《斗室星空》。^①我想借用她的书名来表达,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都太有限,但是每一个人的生命却可以放射出无限的能量。我们可能囚居一室,就在一个小的地方,但是即使身处这渺小的一处,我们依然可以仰望星空,让那漫天的星斗记录我们的心灵世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美妙的梦想离我们一点都不遥远。

在村里的每一个夜晚我都会在外边独坐,不论是冬天还是夏天。当我看那漫天星斗的时候就会想到路遥和他的《平凡的世界》。在路遥去世15年的时候出版了一本纪念文集《路遥十五年祭》,作家王安忆在《黄土的儿子》一文中讲到路遥的一段往事:当冬天过后,走在满目黄土的山里,忽然峰回路转,崖上立了一枝粉红的桃花,此时本该满心欢喜为着春天的到来,但是路遥却眼里浸满泪水。^②你理解路遥流泪的心情吗?当我在泥河沟的一个庭院里,当我背靠着窑洞仰望星空的时候,我理解了路遥。在那孤寂的日子里,面对满目萧索的环境,心底里还藏着一个很遥远却依稀可见的希望。正是因为有了这份希望,所以才让我们在寂寥无声的时候,让我们觉得最孤助无援的时候,也有了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

在空寂的山野之夜,那漫天的星斗会带给我们独特的心灵体验。在那里有人和自然的亲密交流,传递的是人和人之间相互依存的温暖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是渺小的,但我们却不能停止脚步。我身边坐的每一位都是执着的乡土眷恋者,我们是行动者,我们不只在挽救乡村,更是在挽救我们的未来。2013年12月7日,钱理群先生在农大演讲时,结尾的一段话让我难以忘记。他说:“作为一个践行者也许我们是孤独的,但请你不要希望去影响太多的人,就从改变自己开始,继而改变周遭,改变社会,实现悄悄的生命变革。”我想只要我们秉持这样一个理念,我们期待已久的记忆中的乡村就不会从我们的视野中滑落,依然会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和它进行亲密交流的时候,我们和祖先之间通达而美妙的情愫,就会在这里永久地传递着。

[责任编辑 刁统菊]

^① 夏林清:《斗室星空——家的社会田野》,台湾财团法人导航基金会出版,2012年。

^② 王安忆:《黄土的儿子》,李建军编:《路遥十五年祭》,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第163页。

Main Abstracts

The True Faith and Sincerity in Fieldwork

SUN Qingzhong

Fieldwork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method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hen the fieldworker shoulders his package and leaves for the rural area, he is going to inquire about the indigenous knowledge and local wisdom. In the mean time, he also explores the world in which he is living. Therefore, the fieldwork that has transcended the technological aspect, is not only an art of academic research, but moreover, a cultivation of mindset. During this process, accumulated by experiences and feelings, the actor has time to look up into the night stars for a hearty communication with nature; simultaneously, he also gets the warmth and strength coming from the interdependence among his human counterparts.

Key Words: fieldwork; faith; sincerity; rural construction

On Generative Mechanism of Festival Space

SONG Ying

Previous studies of festivals mostly focus on their being unique nodes in time, using the term of "cultural space" to explain the folk activ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which lacks corresponding academic support, and thus wants future resources. Beyond the limitation of "culture space", this article promotes the concept of "festival space" to discuss how society shapes a festival and folklore creates space to represent a festival. Furthermore, six dimensions of generative mechanism of the festivals reveal cultural significance in a traditional festival. Moreover, the term of "festival space" explores the inner relations between culture and folk. Based on this concept, this article advances "each representation" and "the space" to analyze traditional festival folklore as space representation of social activities in the folk. The study of "festival space" is an important academic issue, and a thorough comprehension of festival generative mechanism will promote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festivals.

Key Words: festival space; generative mechanism; culture space; folk;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Multi-senses of Place: An Approach to Ecomuseum

YIN Kai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odernity and localization, the related issues of "place" or "sense of place"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knowledge growth points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In the field of heritage and museology, as a cultural tool of creating "sense of place", the ecomuseum has encountered the dilemma of recognizing community or the rural area in project practice and theory construction. The sensing of place is not unitary, but very subjective and situational. Rural individuals, rural collectives, local governments and ecomuseums all have their own logic of understanding the place, and this kind of multi-senses of place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place and govern the place.

Key Words: place; sense of place; ecomuseum; rural collective; local government

Global Religious Changes and Civil Life in Two Chinese Societies: A Comparison between Jiangsu and Taiwan

Robert P. Weller, translated by LI Shengzhu

In the 20th century, southern Jiangsu and Taiwan were simultaneously swept into the tide of global religious changes, and developed in the direction of national secularization, religionization, rationalization and embodiment. Due to the sharing of very similar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local practices, the two places show a lot of similar religious landscape in the field of Buddhism, Daoism and local temple worship. At the same time, due to the grea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the religious control mechanism, there have been som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gradual evolution of the two religions, such as the different coping strategies in the face of global expansion of new Christianity and religion in Taiwan seems to be more localized than in Jiangsu, and even anywhere in mainland China. Combined with the unique local historical context, to some extent,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religion in Jiangsu and Taiwan can show the modern changes in Chinese society.

Key Words: global religious changes; southern Jiangsu; Taiwan; comparative studies